

转型经济中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 ——中国经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Zhuanxing Jingji Zhong De Jinrong Zhidu Yu Jingji Fazhan
—— Zhongguo Jingyan De Lilun Yu Shizheng Yanjiu

陈刚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转型经济中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 ——中国经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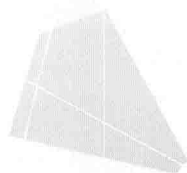
陈刚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F332.1
1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经济中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中国经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陈刚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15-5609-2

I. ①转… II. ①陈… III. ①金融制度-研究-中国②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832.1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675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406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11 插页:2

字数:190 千字

定价:3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无论处于何种经济发展阶段,资本的集聚和配置对一国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中国经济在过去 30 多年里的转型绩效令世人瞩目,其中,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城乡差距日益恶化并存的典型事实是亟待解释的现象。

鉴于金融部门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近年来有大量的文献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尝试解读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城乡差距扩大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坦率地说,这些研究为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文献研究尚未能取得一致性结论,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到盖棺论定的阶段。

我在攻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导师的引导下开始关注中国金融发展问题。在研究生毕业任职高校之后,虽然主要的研究方向已转向了其他领域,但也并未放弃对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兴趣,坚持在国内匿名审稿期刊上发表了自己关于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些粗浅见解。本书研究成果便是我对自己对于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的理解所进行的梳理和总结。与既有的文献相比,本书最可能的边际创新是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在一个逻辑自洽的框架下解释了中国金融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逻辑,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评估了中国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和城乡融合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书得以最终完成并出版,远非作者一己之学识和能力所能实现的。在此,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李树教授和尹希果教授对我的悉心指导,感谢翁卫国博士和王燕飞博士为本书的撰写所贡献的智力和学识,感谢张俏同学所做的

出色的数据整理工作,感谢黄晓老师为本书出版所做的积极的联络工作,感谢出版社各位老师辛勤的校对编辑工作。由于研究局限,本书难免存在一些遗漏和偏误,这些均由本人负责。

陈 刚

2015年7月20日,于西南政法大学天高鸿苑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问题.....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3
第三节 概念界定.....	4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内容.....	5
第二章 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制度安排的逻辑	8
第一节 经济改革与利益补偿.....	9
第二节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利益补偿	12
第三节 利益补偿与金融制度的内生性安排	16
第四节 内生性金融制度下的金融抑制	19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9
第三章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31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31
第二节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50
第三节 本章小结	62
第四章 金融发展与城乡融合	64
第一节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特征性事实	66
第二节 金融发展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72
第三节 金融发展与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82
第四节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90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05

第五章 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以银行业对外开放为例	107
第一节 中国引进外资银行的历程	108
第二节 外资银行与经济增长	113
第三节 外资银行与企业信贷融资成本	13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50
总 结	152
参考文献	155

的预期截然不同。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的现象,即政府对金融体系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长期处于一个不发达和低效率的状态,致使这些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低下,经济增长步履维艰,低收入阶层也难以获得所需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即便像中国这样一个已经连续 32 年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来说,^①由于政府过度管制和干预造成的金融体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并不是十分牢靠(张军,2006)。同时,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伴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张而持续上升(见图 1-1),^②也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在促进收入平等分配方面的积极作用,可能也与经典理论的预期相去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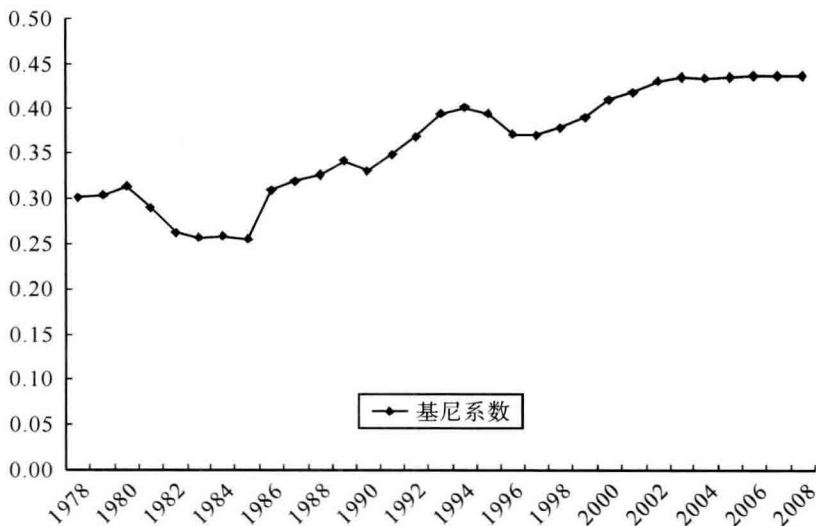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居民收入之基尼系数(1978—2008 年)

^①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9—2010 年,中国经济连续 32 年平均每年以 9.9% 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增加了 20.5 倍,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期,中国的人均收入也由 1978 年的 182 美元增长到了 2010 年的 4 370 美元,跨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

^② 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摘自陈刚(2011)。

那么,首先,转型经济体为何会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并因此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其次,转型经济体中受抑制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最后,什么样的金融改革有助于缓解甚至消除转型经济体中的金融抑制,进而促进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不难理解,上述问题的答案不仅对于理解转型经济体中的金融制度安排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转型经济体的政策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现有研究还缺少对上述问题的全面界定和评估。

鉴于此,本书将以中国经济的转型经验为背景,首先为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的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抑制提供一种逻辑自洽的理论解释;其次,使用经验数据系统评估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后,在理论上阐述了实行金融开放政策对提升中国金融体系效率的重要作用,并在经验上评估金融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低效率一直受人诟病。政府对金融部门的过度干预和管制,以及垄断的银行业机构等原因,被认为是造成中国金融体系低效率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学理上,现有文献对政府为何过度干预和管制金融部门,以及为何要维系垄断的银行业机构,尚缺少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框架。本书以中国经济转型的实施经验为背景,寻求经济转型时期中国金融制度安排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中讨论了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为何会频繁地干预和管制金融部门,以及为何需要维系垄断的银行业结构。

其次,中国金融体系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低效率是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事实,但是转型时期的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现有文献研究中还存在争议。因此,本书还将系统论证转型时期的金融发展对中

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现有研究文献不同的是,本书将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分解为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等三个来源,并分别检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上述三个来源的影响,这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金融发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

再次,中国经济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过程,其中包括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在现有文献研究中却并未得到全面的讨论。鉴于此,本书将全面评估金融发展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具体包括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二元对比系数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最后,本书还以银行业对外开放为例,研究了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对外开放战略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开放红利”,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连续 30 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经济过去所获得的“开放红利”主要源自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国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程度却要低得多,直到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才逐步加速开放。那么,中国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是否促进了本国金融部门的效率提升,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便是一个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的研究课题。

第三节 概念界定

为了使本书的研究具有可操作性,也为了使读者能更准确地定位和理解本书的研究内容,我们需要对本书中涉及的一些关键词和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

(1)“经济转轨”和“经济改革”。本书中使用的“经济转轨”和“经济改革”,指的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中间状态,二者的概

理论和经验上评估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城乡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最后,本书以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为例,讨论和评估金融开放政策对提升中国金融部门效率,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遵循上述研究思路,本书的主要内容拟包括四个部分。第二章,是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解释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制度安排的逻辑。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在转型时期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内生于特定的经济转轨路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满足政府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需要。这使得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偏向,并且造成了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包括利率抑制、垄断的银行业机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

第三章,使用中国各省的经验数据,在理论和经验上评估了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指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造成了金融部门的低效率,制约了金融部门的信息生产和信息分析、项目监控和公司监管、风险分散和风险管理、交易平滑等职能,结果造成金融发展并未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垄断的银行业结构,在抑制了资本积累的同时也未能显著地促进生产率增长,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

第四章,系统论证和评估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指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偏向,通过作用于城乡资本积累差异,导致农村信贷约束,以及城市就业岗位的创造等多种渠道抑制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并且,通过扩大城乡资本积累差异,以及制约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渠道扩大了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距。

第五章,选择以银行业对外开放为例,研究了金融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指出,外资银行的进入可能通过技术溢出、促进银行业竞争和制度溢出等渠道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经验证据显示,外资银行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并且,主要是通过提高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的。进一步的,我们还研究了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

第
二
章

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制度 安排的逻辑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短暂的调整,中国的经济水平逐渐恢复到了抗日战争之前的水平,到1952年,工农业产出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上述优异的经济绩效形势,再加上苏联的支持,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照搬苏联的经验,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①但是,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背离了当时中国经济具有的“资本稀缺,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这种工业体系下的微观企业也自然不具有“自生能力”(林毅夫等,2002)。因此,在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唯一的途径就是利用国家能力对资源进行计划分配(计划经济),将几乎全部的经济剩余投入重工业行业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具体表现为,在财政制度上,中央政府实行了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即国家的财政资源都由中央政府通过计划管理“统收统支”。在金融体系的建设上,中央政府也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它既履行中央银行的金融管理职责,又从事商业银行的各类金融业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随着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中央政府逐渐放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赶超战略,并在1978年开始了以市场化的

^①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滕—罗丹(Rosenstein-Rodan)提出的“大推进”(big push)理论之上的,该理论认为,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可以带来巨大的外部性,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从而快速实现经济发展的腾飞。

经济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之前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已不能满足经济改革的需要,因此,中央政府也着手重新调整和布局金融体系,先后相继恢复和成立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但是,经济改革也是需要耗费成本的,其中,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对改革的抵制和反对是决定经济改革成本的重要变量。理论上来说,如果利益受损集团的抵制和反对所造成的改革阻力和改革成本过高,即便经济改革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性质,其也可能不能顺利地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相应的利益补偿来换取他们对经济改革的认同或支持,降低经济改革的阻力和成本,进而使得经济改革能够得以继续。但是,为了给予利益受损集团利益补偿,中央政府也需要设计并维持一系列特定的制度安排来实现。本章将要阐述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的金融制度安排,一个重要目标便是通过特定的金融制度安排满足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相应补偿的需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内生于中国特定的经济改革路径的。

第一节 经济改革与利益补偿

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是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收益,即是源于制度变迁的推动主体对新制度安排下的潜在收益增量的追逐。同时,制度变迁也是要耗费资源、支付成本的,如:需要支付成本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等的收集、处理和创造以实现新制度安排的设计、变迁和运行。因而,制度变迁被认为是制度变迁主体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部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戴维斯和诺思,1994)。如果面临着过高的制度创新成本的约束,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超过了预期的收益增量,一项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将

会继续存在,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便不会实现。“一种新的安排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一种是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一种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得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了”(戴维斯和诺思,1994)。因而,经济改革也可以被视作政府在权衡经济改革的收益与成本的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行为。

知识的积累、技术的革新或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均被认为是可以影响制度变迁成本的因素(戴维斯和诺思,1994),但这并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本书所强调的是改革阻力在经济改革动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障碍是潜在受损者对改革的反对……甚至对于在政治上并不民主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Laffont and Qian,1999)。本书对改革阻力的定义是:由于利益集团对经济改革的抵制和反对而进行的各类市场与非市场活动,进而给经济改革带来的阻力。

潜在收益的存在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因而制度变迁涉及潜在利益的分配,而对潜在利益的分配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因而,经济体制改革也必然要触及对旧有经济体制下利益存量的调整和新经济体制下收益增量的分割,这将会改变人们(包括个人、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而这恰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害所在”(樊纲,1993)。由于经济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新增利益的分割,要使经济改革在获得所有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即便经济改革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的性质,^①它也会由于经济改革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或新增收益的再分配而引起人们利益格局的相对变化而受到一些人的反对。那些在经济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个人或利益集团将会动用其手中的经济与非经济资源极力阻止经济改革的推行,以延缓或阻止经济改革的进程,只要这样做给其带来的收益增加或者收益损失的减少大于其所付出的成本。同时,经济改革阻力的大小不完全取决于反对经济改革的人或利益集团的数量,而更多的是取决于这些人或利益集团手中掌握的经济与非经济权利资源,即使

^① “帕累托改进”是指改革本身至少使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任何人受损;“卡尔多改进”则指改革中受益总量大于受损总量,以至受益者可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不受损。